

【学人专访】

教育与土生华人研究

——陈耀泉博士专访

An Interview with Dr. Tan Yao Sua

Research Studies on Educational and Chinese Peranakan Issues

黄欣怡*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Ooi Sing Ee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singee1118@gmail.com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0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Ooi, S. E. (2020). 教育与土生华人研究 ——陈耀泉博士专访.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1(2), 186-200.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8.2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8.2020>

摘要

陈耀泉博士为檳城理科大学教育发展史博士，2005 年升任为理科大学政策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兼高级讲师，现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陈博士的专长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华教运动、少数族群教育、双语教育、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社会学、教育隔离现象以及土生华人研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共出版专书十七本，五本是个人的著作，其余是合著，以英语、马来语撰文。他退休后耕耘不辍，于 2020 年底出版新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陈博士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与学术经验，均可为中文学术界相互参照；教育社会学的专业，则可在饱和的华教运动研究，开拓华文教育研究的新面向。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课程博士生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人、华教运动、少数族群、土生华人

Abstract

Tan Yao Sua holds a doctorate in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t University Sains Malaysia. In 2005, he has been promoted to a senior lecturer an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SM. He is now an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His research experts include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ethics minority educa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analysi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segregation, and Peranakan Chinese. He has been published 17 books within 30 years of his academic career, with 5 of the books written on his own, and the other with a co-author. He is writing his papers in English and Malay medium. He has been retired recently and works hard as usual, where is a new book with the tit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has published in the end of 2020. Overall, due to his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results, it will become the cross-reference for Chinese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meantime, his experts o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ill explore new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educational issues.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Ethics Minority, Peranakan Chinese



小引

获知《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学人专访对象是陈耀泉博士后，迅速在文运书坊搜寻他的著作，买了几本有关华文教育研究的学术著作。其中最想一读为快的，是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¹试图在中文学术界熟悉的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²四大册之外，探寻英文学术界对相关议题的介入与关怀，如何在现有的知识结构，提供予我们观点启发及思考碰撞。

疫情稍缓的9月，陈老师与我们相约在峇眼三目新村泰式河鲜餐馆相见。带着无法一窥学者书房的遗憾，以及餐馆是否能很好采访的担忧，来到这家坐落在檳城、霹靂及吉打边界的新村餐馆。陈老师已订好包厢，熟练的点好菜就马上开始访谈。陈老师细心地按照事前提供的采访提问单准备讲稿，并不时在随身携带的小书袋掏出数本他在谈话中提及的学术著作，给予中肯的评述。包厢桌面上摆满了佳肴、书本、学术家常以及师母的陪同，似乎构成陈老师生活的大半部。

在学人专访不怎么普遍的大马，我们只能在理工大学的学者网页找到陈老师的研究著作，以及从著作中推想他的学术经验。他的成长经验与教育背景，如何

¹Tan, Y.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20.

²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1-4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2003）。

连接到华文教育和土生华人研究领域的契机，成为了解学人治学生命经历的关键词。

“那就从小时候讲起。我自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境，求学是一步一脚印，不敢有太多的梦想。所幸成绩还不错。高中毕业后，进入吉隆坡蕉赖工艺师训学院接受两年的培训，于1979年被派到太太的家乡瓜拉登嘉楼开始执教。执教之余，1981年以私考生的身份自修，考取高级教育文凭。两年过后进修理大远距离课程，主修地理，副修文学。那时候校方不要学生太过压力，把课程拉长，花了六年才完成学位，非常辛苦。”1990年本科毕业后，对学术研究深感兴趣，继而在理大进修硕士和博士。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进入理大服务。这期间他已在国民中学执教了二十余年的书，自称是“半路出家的学者”，也成为“我在学术起步得比较晚”的缺憾。

Haris Md. Jadi 专书的启发

陈耀泉老师华文教育研究始自硕士阶段，论文著重于族群教育政策，乃启发自 Haris Md. Jadi 的专书——《族群、政治和教育》(Etnik, Politik dan Pendidikan)³。“他的书我有带来。”陈老师随即从书袋里掏出第一本引导他踏入学术书写的著作，展示给我们看。这本书改自 Haris 的博士论文 *Ethnicity,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n Educ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⁴“他当时是理大教育学院的讲师，是一位开明的马来学者，对马来西亚教育的发展，不像一般马来学者那样偏激。我在本科毕业后想修读硕士，但对研究课题毫无头绪，直到读了他的书，才决定研究和这本专书类似的课题，但是把焦点放在华文教育。”为此，陈老师还特别造访 Haris，获得他的鼓励和指点，他还推荐 Chai Hon Chan 的著作 *Edu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⁵作为研究的参考。“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以少数族群教育的理论，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读了 Haris 这本书，我可能不会进入教育政策研究这个领域。”陈老师硕士论文题目为《董教总与华文教育政治（1960-1982）：马来半岛华人少数族群保存语言、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⁶Haris 还成为了他论文的校内评审。

³Haris Md. Jadi. *Etnik, Politik dan Pendidik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0.

⁴Haris Md. Jadi. *Ethnicity,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n Educ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1955-1970*, Thesis (Ph.D.) of University of Keele, 1983.

⁵Chai, H.C. *Edu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Canberra: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of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⁶Tan, Y.S. *Politik Dongjiaozong dalam Pendidikan Vernakular Cina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在这议题上，他的总结是：“以少数民族教育来看，我认为少数民族的教育不该凌驾多数族群的利益，而多数族群也不该否决少数民族教育的权益，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一个“多元困境”（pluralist dilemma）的大马要面对的问题。”陈老师认为双语教育是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由此延伸成他博士论文对相关议题的关怀——大马半岛华裔生的过渡性双语教育，着重于华小生进入国民源流中学所面对的课题，以双语（马来文和华文）学习作为研究架构。“研究这个课题，英文叫 *transitional education*，最令我感叹的是华小教育无法和国民源流教育衔接，主要是不少华小生的马来文程度太差，而且过渡时期的预备班又办得不好，无法提升他们马来文程度，学生升上国民源流，面对学习障碍，导致一些半途辍学。根据早年马华找的资料，华裔辍学率高达 20% 到 30%，10 位当中就有 2 位辍学。”

另一方面，华小生读了六年的母语教育，却在进入中学阶段对学习华文热忱很低落，也是陈老师关心的教育现象。“有者甚至在教育文凭考试中放弃华文，主要原因是华文科难考，要考获特优，难如登天。总的来看，过渡性双语教育对一些学生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华教运动研究的饱和

关注陈老师脸书的网友大概都知道，陈老师藏书，藏得很凶。他对学术著作尤其看重，对华文教育研究状况非常关注，由此对现况给予苦口的劝告：“我认为华文教育研究，尤其是华教运动研究，包括人物志、历史发展和政治抗争的 *chronological narrative*，已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除非有新理论，否则不宜再从事华教运动课题研究。”

陈老师指出这方面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中文学界，“我发现中文系的学者和硕博生特别喜欢研究华教运动，仿佛已成为他们的‘专利’。”让他感到惋惜的是，与来自教育系的学者和硕博生相比，中文学者一般都缺乏教育理论的根基，无法为华教运动提供具备理论性的看法。“他们的研究往往成为资料汇集，极为可惜。”在英文学界，他说也有这一类资料汇集的书，但不多。比较显著的例子是 Lee Ting Hui 于 2011 年出版的著作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⁷ “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只是把华教运动发生的事情，根

1960-1982, Pulau Pinang: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5.

⁷Lee, T.H.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据年代、时期汇集起来，作为一本资料书是可以，但作为一本学术研究，我觉得不够格。”以马来文撰写华教运动的专书，在 2013 年则有张荣强的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Satu Kajian tentang Perjuangan Dong Jiao Zong (1970-2002)* (《马来西亚华教运动——董教总抗争运动研究(1970-2002)》)，⁸“改写自其博士论文，虽然非常厚重，可惜理论上非常贫乏，极为可惜。”

“关于华教运动，我总结一下，除非有新的理论作为切入点，否则华教运动研究将无法有突破性的发展。”陈老师接续说：“少数族群教育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我以这个新的理论作为切入点，用来探讨董教总在教育政治这个课题上，华人作为少数民族对教育权益的要求，以及马来人作为多数族群对教育的需求，两者的冲突在哪，如何妥协，这也是一个研究的切入点。”

说到这里，陈老师提醒道：“我不知道你的研究是叙述还是论述，当然一定要两者兼顾。论述要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要从某个理论或主题出发，像现在很流行的离散，也是一个主题。总之你要有一个框架来看，学术性才会提高，没有这个框架，我们很难总结，总结时候就觉得好像在重复一些叙述，无法放在比较高的角度看这个课题，这就是学术研究。刚才你们提到的郑良树四大册，其实很可惜，资料相当多，但学术价值很低。除非你在做历史研究需要参考资料，那就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若和陈绿漪的《马来亚华文教育政治（1945-1961）》⁹相比，就缺少了该有的学术价值。”

华教研究关怀面向

在陈老师华文教育关怀面向上，他所希望看到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有两个层面：“第一，有关华教运动的研究，我希望论述多于叙述，一般的叙述已无法带动华文教育研究。以不同的理论来研究华教运动，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这些理论，可以涵括教育、文化、族群、政治理论。以我比较熟悉的教育社会学理论来举例，华教的文化遗产，可以以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的理论来论述。第二，我希望更多学者投入非华教运动的研究，以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方式为主导，质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式为辅助，开拓更多研究课题。这样双管齐下，华文教育研究的发展将会更全面化，更加蓬勃。”

⁸Cheong, Y.K.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Satu Kajian tentang Perjuangan Dong Jiao Zong*,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2.

⁹Tan, L.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非华教运动相对中文学术界而言是陌生的，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在我们听来亦颇为新颖。陈老师解释道：“量化研究一般上可以通过问卷来搜寻田野资料或数据，现在已有 SPSS 电脑软件可以将资料输入分析，有相关课程可以上，不像我们以前要自己摸索；质化也可以用软件分析，比较普遍的是访谈，从访谈的主题分析获得结论。这两者都要受过特别的训练才可以进行田野调查，如果没有特别的训练，往往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

在非华教运动领域，陈老师比较有兴趣的课题包括宏愿华小的族群交融状况、选择就读独中的原因、华小和国中衔接的问题、非华裔华小生的课题，包括选择华小的原因、学习的问题、和华裔生交流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以抽样的量化研究，比如设计问卷来收集数据，再以质化研究，比如以访谈来解析这些数据。这样的研究方式，更可以厘清事实，也更有科学的根基。”

陈老师随手拈来过去研究的个案来谈，比如说报章渲染非华裔生选择就读华小的现象，经常指向他们读华小是为了要学习华文，但研究成果不一定导向这个因数。“我的研究就不一样，非华裔父母送孩子进华小，主要是因为华小的成绩表现 *academic excellent*。当然学习华文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次要，通过量化研究可以整理出主要的原因来。”华小族群交融也是陈老师长期关注的议题，“董教总常说，马来人送孩子来华小，华小作为国民团结地位就可以取代，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进去华小看，马来人还是跟同类交流。除非有特别的原因，比如说想问一些关于数学的问题，他们就跟你交流；在休息时间，同类交流就很普遍。”

另外，他认为有必要加强东马华文教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经常被疏忽。比较特出的是杨佳佳的《政府的教育政策对砂拉越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1841-1989）》。¹⁰“目前看到的华教课题就是华教运动，不然就是华教人物，廖文辉就写了一系列，他们都是历史背景，因为没有社会学背景，不敢进入其他领域。”

摆脱族群性的干扰

教育政策研究最棘手的问题，大概是族群命运的沉重背负，中文学术界带有感情的介入，往往将学术转变成一种对政府教育报告的控诉。在陈老师新著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看到有别于中文学术

¹⁰杨佳佳，《政府的教育政策对砂拉越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1841-1989）》（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11）。

界对教育政策阐释的观点，尤其在最为华社诟病的拉萨报告书最终目标，能从马来社会迫切期待教育可以带来的社会流动力（educational mobility）的背景论述，说明政府制定政策的难处；同时亦兼顾非马来人诉求的书写。这大概是在中文学术研究难以看到兼容并立的持平立场。从陈老师华小、国民型至国立大学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教育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学者论述的观点。

“你们是什么样的教育背景？首先华小，然后国民型中学或独中，大学到台湾或大陆去？你看，我们的文化背景就不一样了，我们接触的人不一样，读的书不一样，你们的过程是纯华人，我的过程比较混合，所以我们对某些事情看法就不一样。”除了得益自成长教育背景，陈老师说他这个训练师是当初在写硕士论文时候，指导老师的提醒：“我研究的是董教总政治问题，他常常提醒我说，最后你这本论文呢，是要经过马来学者的内审和外审，他们会怎样看你的论文？我在写论文就有诸多考虑。”

陈老师在上文提到的新著，以土生土长（indigenous people）来指称马来人，是否也出自这番考量？为顾及论文审查，他说必须考虑他们的观点：“马来人没有离散的概念，他们的概念是 merantau，就是出去旅游，一个岛走到另一个岛，都是我的家。”陈老师认为，国立大学的华教运动研究比较中立，主要是学者们考虑得比较多，他们接触到马来学者，也读马来文和英文专书，最要紧的还是考虑到审查老师是马来人。

“华文教育研究，尤其华教运动研究，往往涉及敏感的族群与政治课题，从政策层面来看，更是如此。学者研究这些课题，一定要保持中立，不可以太过于 judgemental。比如针对某个政策，一定要考虑各民族的立场，而且一定要有参考资料，有人说过我们才下定论。这一点很重要。马来人对一些教育课题的看法和华人往往不尽相同，比如马来人把华教人士看成沙文主义者，而华人则把他们当成华教斗士，作为一位中立的学者，就要严正的看待两方面的立场，再理性的下定论，而不是一面倒的支持某个立场。”

单一和偏颇的看法往往会引起争议，陈老师指出柯嘉逊的华文教育著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显然是为华教人士而写，而不是为学术而论述，立场偏袒华教。在学界，我们不太公认这本书；但在华社，它是一本畅销书。”陈老师又从百宝袋掏出橘色封面小书说：“如果学者参考了这本书而没有参考其他的，这会影响他看待华教的立场。”同样的，陈老师指出马来学界也有立场单一和偏颇的著作，“比如 Ibrahim Saad 那本 *Pendidikan dan Politik di Malaysia*。¹¹他是马来主义者，可以与柯嘉逊作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们读了这

¹¹Ibrahim Saad. *Pendidikan dan Politik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7.

两本书，就会觉得差距那么大，一个为华人写，一个为马来人写。”

陈老师又回到理论的重要性说道：“如果我们有一个理论的框架来看这些课题，就会比较理性化。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服务的是学术，不是服务自己所研究的单位。当初我写董教总，虽然去参考资料，最后也是对他们有批评，也不是说批评，而是理性分析背后的原因。”

不同语言书写的参照

如此，不同的语言思考与书写，讨论的方式很不一样，两者应该如何互相参照？陈老师首先指出中文学界聚焦于华教运动，和不同语言思考没有关系。“也许是这方面的中文文献特别多，方便研究。这也可能是中文学者大都来自于华文教育体系，对华教运动有一种情意结。马来学界甚少研究华文教育，这也不是语言思考的问题，而是他们不谙华文，无法参考华文资料。以马来文书从事华文教育研究的都是华人学者。英文学界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华教运动，他们大都懂得华文，只是书写能力比较差，跟语言思考没有关系，主要是资料来源。”

中文学界和英文学界书写和讨论方式的不同，陈老师觉得还是在于理论的应用。“我发现英文学界在讨论华文教育时往往有一个理论的架构。我本身也曾以少数民族教育的理论架构来讨论董教总主导的华教运动。这是因为英文学界出版的有关华教运动著作大都是从硕博论文改写的，理论架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文学界非常欠缺这一类著作，这也包括中国大陆学者的著作。我能想到的是林开忠的《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¹²这些都不是因为语言思考的差异，而是理论建构的问题。”

陈老师进一步直接点出：“中文学界在这方面缺少理论根基，也许是他们的英文不好，无法有效的参考英文著作，而教育与文化理论是西方的强项。这一点，中文学者要向英文学者看齐，就算一篇普通的论文，也要有一个主题论述，而不是一味的叙述。

另一方面，中文学者在书写华教运动研究，大多以华社的角度来看华文教育的发展，甚少论述其他种族对教育政策的诉求，论点偏向华社的利益，不够中立。“比如把国家教育政策等同于消灭母语教育的政策，而忽略了教育政策是各民族互相妥协的结果，是一个折中政策，并没有消灭母语教育的意图，至少在小学阶

¹²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

段是如此。而马来民族往往把民族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这一个看法，这也是中文学界无法体会的。”

我们请陈老师提出他所欣赏的华文教育研究学者及著作，上文陆续提到一些，包括刚刚提及的陈绿漪。陈绿漪博士是前理大历史副教授，也是陈老师硕士论文的副指导老师。他推荐她最经典的著作是《马来亚的华文教育政治（1945-1961）》（*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¹³“这本著作改写自她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97年，至今仍是华教运动的经典参考著作。这本著作主要论述“三大机构”（马华、教总、董总）在华文教育发展上的政治纠纷。何启良在评论这本著作时说：‘此书资料充实，文字顺畅，立论严谨。’”除了这本著作，陈老师说她的一些论文也值得推荐，比如〈董教总及文化霸权的挑战〉（*Dongjiaozong and the Challenge to Cultural Hegemony*）。¹⁴“每个人都知道‘文化霸权’，但要想到这个概念就比较难。”

另外，陈老师也向我们推荐 Ang Ming Chee 的著作。说着，他又从书袋里掏出一本以“华教基石”为封面的著作来。“Ang Ming Chee 这本专书同样改自博士论文，是华教运动研究中最为值得一提，题目是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1-2011*，2014年由新加坡 ISEAS 出版。¹⁵以机构及社会动员来研究华教运动，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至于 Karen Teoh¹⁶书写的女性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对于过去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以及莫顺生¹⁷比较简略关于教育的整理，他们都有跟过去比较不一样的视角，可以超越华社的一个眼光。

陈老师在理大政策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讲师与研究员，主要研究教育课题。除了华文教育，他也研究其他课题，比如教育民主化、教育隔离现象、教育与国民团结、双语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研究华文教育的专家，其实我的华文教育只限于硕士阶段，当然过后写了一些华文教育的论文。我的兴趣也有其他方面，像教育隔离、教育和国家建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各单位邀请要我就是要我讲华文教育，像林连玉基金会、董教总和华总。”到底谈华文教育跟您兴趣的教育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有什

¹³同注释9。

¹⁴Tan, L.E. “Dongjiaozong and the Challenge to Cultural Hegemony 1951-1987”, In *Fragmented Vis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Joel, S.K. & Loh, F.K.W. pp.181-198, Sydne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¹⁵Ang, M.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1-2011*,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4.

¹⁶Teoh, K.M. *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¹⁷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林连玉基金，2000）、《马来西亚教育史 1415-2015 与华教发展》（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

么困扰？陈老师说：“其实没有困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我本身可以掌握。只是他们把我标签为教育研究专家，其他课题方面好像少为人知，觉得有点可惜。”

在村落消失前赶紧研究土生华人

在华文教育研究领域四五年觉得饱和了之后，进入土生华人研究领域，他说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话说 2009 年，我住在瓜拉登嘉楼的岳父逝世，回去奔丧，巧遇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得知他住在猪莪（Tirok），离瓜登约 17 公里的一个土生华人小村落。由于当地年轻人口严重外流，他建议我研究这个小村落：‘在这个村落还没消失之前赶紧保存下来’。我听后颇感兴趣，况且东海岸华人研究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非常欠缺，是值得开拓的一个研究领域。从瓜拉登嘉楼回来后，我开始撰写土生华人研究计划，向大学申请研究基金，不然登嘉楼距离檳城太远，我无法以个人身份去执行计划，也没有这个财力。研究计划获得大学核准，开启了我的土生华人研究计划。《登嘉楼猪莪土生华人：身份认同的保留与转换》¹⁸这本专书就是这个研究计划的成果。”猪莪华人在登嘉楼是少数族群，这研究说来还是在陈老师的专业关怀。

这本专书以马来文撰写，出版于 2012 年。对猪莪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深入的研究，大都来自田野调查。“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年老一辈的猪莪土生华人还保留了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但年轻一辈却慢慢的被汉化了，失去了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有两个因素导致年轻一辈被汉化。第一，他们普遍受华文教育（年老一辈大都受马来文教育）。第二，年轻一辈和城市华人的接触比年老一辈频繁。后来，我把土生华人研究扩大到吉兰丹土生华人，以巴西巴力（Pasir Parit）土生华人为个案，研究他们的身份认同。吉兰丹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极为复杂，除了华人与马来人的文化特征，还有明显暹罗人文化特征。他们是福建人，也被称为福建暹。”陈老师抓紧这个机会，研究瓜拉登嘉楼唐人街的历史。同时也探究华人在一个马来州属作为少数族群，如何保存他们的文化，以及华人与马来人之间微妙的关系。

华文教育和土生华人是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是中文学术界所熟悉的文献研究，后者则是社会学研究。陈老师在硕博阶段前后受过这两方面的训练，所以他自信有足够能力进入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我在进入土生华人研究时，

¹⁸Tan, Y.S. & Kamarudin Ngah. *Cina Peranakan Tirok Terengganu: Pengekalan dan Peralihan Identiti*,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2.

并没面对很大的问题。倒是土生华人研究因为现成资料比较少，涉及的田野调查比较耗时，其中包括观察和访谈。我一直以为一个研究者，应该掌握不同的研究方式，这样做起研究，比较得心应手。学术研究方法主要分为量化研究、质化研究、量化和质化混合研究，研究方法依课题而定。量化研究方面是以问卷收集数据，而这些数据，除了电脑分析之外，也涉及访谈的质化研究。”陈老师分享他曾审查过一些中文系学生的论文，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量化研究。“通常以最基本的巴仙来分析田野资料，比如 52 巴仙赞成，48 巴仙反对，就讨论赞成的原因。其实，受过量化研究训练的人都知道，52 巴仙对比 48 巴仙是没有明显的差距（significant difference），是不值得讨论的一个数据。”

陈老师共出版十七本著作，五本是个人的著作，其余是合著。“合著的部分，我都是第一作者（first author）。何谓第一作者？第一作者就是著作的主要撰写人，其他作者只是从旁协助，有时是提供资料，有时是修改一些文字。”

大学知识人的位置

陈老师退休后仍持续读书、著述，他是如何看待马来西亚学人的学者角色以及大学知识人的位置？尤其是在现有讲求国际排名以及学术发表的体制，他理想中一名学术人的理想形态是什么？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在冷热之间如何自立？

（一）对国际排名及学术发表体制的见解

世界大学排名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课题，主要是评估项目偏向西方先进大学，尤其是英美大学。世界大学排名是大学全球化的一个现象，其中就包括以国际学生、国际合作及国际学刊的发表来评估一间大学的排名，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带来极大的压力，尤其学术人员，更是被迫在国际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学刊发布论文。我还没退休前，也面对这种压力。这类学刊多数是英文源流学刊，英文能力不强的学术人员是无法在这里发表论文的。另一方面，这类学刊的门槛极高，要在这里发表论文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

学术人员对大学排名持不同的看法。赞成者认为大学排名可以增加大学的声望和竞争力，以及促进大学国际化；反对者则认为大学排名背离了大学的基本功能，比如教学、社区参与都没被列入评估项目。不管如何，大学全球化是无法忽视的一个大趋势。大学当局应该适度拿捏，达到一个平衡点。抗拒世界大学排名，只会被边缘化，也无法和国际接轨。一间大学如果能打响国际知名度，将有助于

其未来的发展。

(二) 理想中的学人形态及其在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冷热关系

我认为一位理想的学术人应该治学严谨，勤于研究，好学不倦，把学术当成一辈子的事，而且要有谦虚的风范。遗憾的是，很多学术人员的学问还停留在博士的阶段，原地踏步，固步自封，有些甚至是教授级的人物，所谓的 *Profesor Kangkong* 就是指这些人。

大学学术人员往往有一种挫折感，那就是研究的成果无法带来实用的价值，仿佛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成果成了冷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如此，给人一种躲在象牙塔里搞研究，脱离现实的感觉。比如当年的数理英化政策就有不少研究成果质疑这个政策的可行性，然而决策者却没有采纳这些研究成果，一意孤行，漠视有关的研究成果。然而，一些研究，尤其是人文研究，纯属 *knowledge creation and production*，比如历史和文学研究就不用在意其实用价值。如果学术人员能争取到委托研究 (*contract research*)，那么研究成果就会有实用价值。然而，这类学术研究往往要迎合委托方的意愿，失去了学术的中立性。

小结：走出中文传统的思考方式

采访结束前，我们请陈老师分享他对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他说：“我在这里引用何启良（教授）的说法：‘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量大，质量小，需要改进。’他是这样说，我也认同。与早前毕业于西方国家的教授不同，现今中文学界的讲师多毕业于台湾或中国，因此被局限在中文的范畴。这不能说是语言的问题，文化层面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学生能到西方大学修读博士，回来视野或许更为广阔。”

短短几个小时的学人专访，陈耀泉博士除了精辟评析了目前马来西亚华人教育研究的局限，亦为中文学界提供各方不同的研究面向，像上文提及的少数民族政策、文化再生产、非华教运动研究，均是很好的议题拓展，得以让我们跳脱过去中文较为传统的问题思考方式。

【征引文献】

一、中文著作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林连玉基金,2000)。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 1415-2015 与华教发展》(雪兰莪: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

杨佳佳,《政府的教育政策对砂拉越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1841-1989)》(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11)。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 1-4 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2003)。

二、英文著作

Ang, M.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1-2011*,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4.

Chai, H.C. *Educ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Canberra: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of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Haris Md. Jadi. *Ethnicity,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an Educ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1955-1970*, Thesis (Ph.D.) of University of Keele, 1983.

Lee, T.H.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Tan, L.E. “Dongjiaozong and the Challenge to Cultural Hegemony 1951-1987”, In *Fragmented Visio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edited by Joel, S.K. & Loh, F.K.W. Sydney: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181-198.

Tan, L.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n, Y.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20.

Teoh, K.M. *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三、马来文著作

Cheong, Y.K.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di Malaysia: Satu Kajian tentang Perjuangan Dong Jiao Zong*,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2.

Haris Md. Jadi. *Etnik, Politik dan Pendidik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0.

Ibrahim Saad. *Pendidikan dan Politik di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7.

Tan, Y.S. *Politik Dongjiaozong dalam Pendidikan Vernakular Cina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960-1982*, Pulau Pinang: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5.

Tan, Y.S. & Kamarudin Ngah. *Cina Peranakan Tirok Terengganu: Pengekalan dan Peralihan Identiti*,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2.